

责任编辑：程莉莉

新闻热线：(010)84151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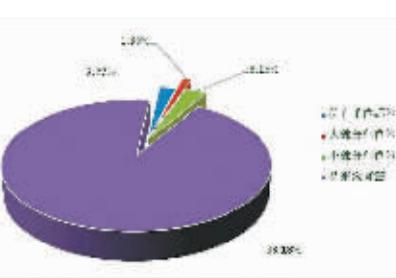
E-mail:grrbmgz@163.com

## 因患病晚期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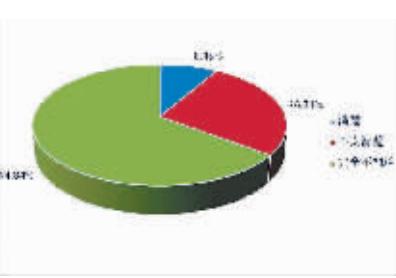
# 82%尘肺病农民工在家里去世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发布，尘肺病农民工深陷四大困境

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是否清楚粉尘工作对身体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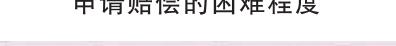
干活时是否佩戴防护面具



没有佩戴防护面具的原因



获得工伤保险的情况



申请赔偿的困难程度



新疆：“就业工场”实现家门口增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9日电 (记者熊燕)今年以来,新疆一些地方盘活本地特色资源,创建乡镇“就业工场”,培育投资少、用工多的小微产业项目,有效拉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在位于伊犁河谷的霍城县央布拉克村“就业工场”,30岁的夏力万古丽正在车间指导20多个妇女缝制一批民族特色服装。“她们都是当地农民,简单培训后就能加工服装,熟练工一个月能挣1500元。”夏力万古丽笑着说,“来找我们做衣服、做校服的多得很,根本忙不过来。”

夏力万古丽曾在正规服装厂学过缝纫技术,回家乡创业是她的梦想。这家“就业工场”约20台设备通过镇政府购置、江苏援疆前方工作组捐助和自筹3个渠道解决,场地在村委会基础上改建,免费提供,仅此一项每年可为夏力万古丽节省5000元。

霍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江莉红介绍,今年全县利用村镇、社区闲置土地和空置办公场所建设30个“就业工场”,引进生产有订单、技能要求低的小微企业,培育民族刺绣、薰衣草及茶叶加工等小微产业项目,年底可解决就近就地就业800人以上,带动实际1200人以上,实现富民增收3000万元。

为防止“就业工场”成为“短命工程”,霍城县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措施。

今年6月,国家拨付1.32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新疆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硬件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此前研究制定了90项具体措施、16项实施方案力促就业。

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 困境1:死亡阴影笼罩村庄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4)》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不外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高的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

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 困境2:负债累累压垮家庭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28%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政府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

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政府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 困境4:保护缺位致重蹈覆辙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10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10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才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人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 【一周大小事】

### 18年换14份工作

### 农民工终于有了社保

据《人民日报》7月8日报道,甘肃省秦安县农民工李成义在京打工18年,前后换了13份工作,可没有一家单位给他上社保,直到2013年8月,他才碰上一个能给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员工上社保的单位,而他真正拿到社保卡是2014年3月。算下来,他工作18年换了14家单位才换到了社保。

**[点评]**社会保险属于法定强制保险,企业和员工都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在实际操作中,用人单位不给职工上社保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像农民工李成义这样,18年换14份工作才等到社保的遭遇着实有些令人吃惊。一边是劳动保障部门呼吁“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一边是农民工工作多年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除了用人单位图省钱不主动缴纳外,劳动保障部门是不是存在监管不力的可能呢?

### “90后”农民工 社会融合境况堪忧

据《人民日报》7月8日报道,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联合在京发布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分析调查。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基本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但“90后”农民工社会融合境况堪忧,其社会融合指数(包括经济立足、社会接纳、文化交融、身份认同四指标)得分仅为55.7分,比“80前”和“80后”农民工均低10分左右。

**[点评]**“90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而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按理说他们的社会融合指数应该较高。但国家卫计委的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一方面原因是“90后”农民工稳定性较差,专业技能较缺乏,社会历练较少;另一方面是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并未将他们纳入其中,这导致了他们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降低。因此,加强对“90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加快落实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 伪造矿难骗赔 农民工锤杀4工友

据《人民日报》7月8日报道,21名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农民工,组成一个团伙,偷偷实施着一桩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共锤死4名工友,并制造“矿难”假象,骗赔约185万元。近日,这桩特大系列“杀人骗赔”案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点评]**《南风窗》这篇报道被网络媒体以“真实版《盲井》”为题广泛转载,但事实上,现实比电影《盲井》里面的情节更残酷更冷血。据了解,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杀人伪造矿难事件就开始出现。近年来,此类案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呈多发态势。有网友称,这是贫穷滋生出的罪恶之花。但笔者认为,贫穷不必然产生罪恶。如果不是“死亡指标”的层层下压给了犯罪者可乘之机,如果有关部门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这种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点评:杨召奎)

## 河南安阳:

### 留守儿童舞动暑假

7月8日,留守儿童在河南省内黄县青少年活动中学习舞蹈。

暑假来临,河南内黄县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房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练习舞蹈的身影。

刘肖坤/CFP

# 不必为绿皮车谢幕而惋惜

所以部分农民工还愿意选择这样的列车是另有原因的。

对于外出农民工而言,乘坐火车往往是因为回家或变更打工地点,这样的旅途往往要携带铺盖,甚至拖家带口,需要购买多张车票,几百元的动车和高铁票价看似不多,若乘以全家的人数,再乘以往返的2次,实际成本就到达四位数了。更何况动车和高铁设立区间较大,通常在地市设站,而居住在县域的农民工,下车后还要再倒汽车,又增加了一笔支出。

在火车站,人们往往能看到两类泾渭分明的乘客群体,涌入绿皮车的多为扛着行李的农民工,而等待动车的大多是衣着光鲜的城市居民。两种列车,两种乘客,既是当下城乡二元化的写照之一,也让许多人把绿皮车当成农民工专列的代名词。

农民工选择绿皮车,其实是无奈之举。许多绿皮车没有空调,设备老化,见站就停。不论速度还是乘坐舒适度,都令人难以恭维。

当然,动车组和高铁取代绿皮车等普通列车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现代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使铁路客运不断提速,不断为乘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对于跨省务工人员来说,铁路是主要的出行工具。长长的铁轨,连接着城市和乡村,一头是等待,而另一头则是梦。

一般来说,不能因部分人群怀念绿皮车的票价,就推迟整体路网的提速更新,这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应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原绿皮车乘客群体,提供可替代的出行方式,例如在动车和高铁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后,可以适当降低票价,并发挥公路客

运的补充作用,以减少他们的出行成本。

其实,就今天的农民工而言,收入不断提高的他们,也不见得全部钟爱绿皮车。在最近两年的春运中,农民工群体搭乘高铁甚至飞机返乡已经不鲜见。绿皮车被拉杆箱取代,破胶鞋变成了新皮鞋,行李里装着存折,那是准备回家买房买车的款项。富裕起来并不断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正在蜕变成新市民,他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也自然在发生变化,甚至对交通工具的舒适度和速度需求,渐渐超过了价格需求。换言之,虽然依然有农民工青睐绿皮车,但不等于农民工只配坐绿皮车。单纯用“农民工没得坐”为绿皮车的谢幕惋惜,显然已经

不合时宜。

飞驰而过的列车穿越暮色中的城市,它们承载着的不仅是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思念,也是新市民的梦想。希望有一天,农民工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成为动车和高铁的常客。到那时,不仅说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已经成功,而且农民工向新市民的转型,也已驶上“高铁速度”的快车道。

【打工路上】